

从东方教会看景教与聂斯托利派的关系

刘清一*

景教一向被认为是中国的聂斯托利派,这一论断似乎意味着聂斯托利派是直接传入中国的。但事实上,历史上的景教只是东方教会传入中国的一个分支。景教与聂斯托利派的这一直观联系,离不开历史上东方教会神学思想上的变迁。换言之,景教之所以被人称为聂斯托利派,盖因东方教会在7世纪初受到聂斯托利主义影响,并在基督论上转向了聂斯托利主义。

景教是基督教与中国第一次相遇的产物,但是当人们谈到景教,总是把它直接和聂斯托利派联系在一起,把景教称为中国的聂斯托利派。但这样的联系却直接跳过了作为两者桥梁的东方教会(Church of the East)^①,或潜在地认为东方教会就是聂斯托利教会(Nestorian Church)。对此,一些教会领袖和学者表达了不同的看法。^②那么,景教和聂斯托利到底有何关联?在何种程度上,景教可以被认为是聂斯托利派的?而作为沟通西方和东方的中介的东方教会,是否

* 刘清一,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① 现在常称为东方亚述教会(the 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因为东方教会在近代发生了大分裂,最后分裂为东方亚述教会和迦勒底天主教会(Chaldean Catholic Church),由于后者与罗马天主教共融,所以一般东方教会指东方亚述教会。此外,在基督教历史上还存在另外两个“东方”的教会:一是“Eastern Orthodox Church”,即人们常说的东正教,其与西方的天主教会因长期的政治神学等分歧最终于1054年发生大分裂,以拜占庭帝国教会和俄罗斯教会为代表。二是“Oriental Orthodoxy Church”,即东方正统教会,该教会产生于卡尔西顿会议之后,由于在基督论上坚持一性论,遂与其他卡尔西顿教会断绝关系,独自建立教会,以亚美尼亚教会、科普特教会为代表。

② 相关学者讨论参见 Sebastian P. Brock, *Fire from Heaven: Studies in Syriac Theology and Liturgy*, New York: Ashgate Publishing, 2006。东方亚述教长 Mar Dinkha IV 和迦勒底天主教会教长 Louis Raphael Sako 都公开反对“聂斯托利教会”的称呼。参见 Sebastian P. Brock, “The Nestorian Church: A lamentable misnomer,”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78. 3 (1996), p. 35; Louis Raphael Sako, “The Church of the East isn’t Nestorian,” *Christologie-Kirchen Ostens-ökumenische Dialoge*, Frankfurt, 2017。



应当被认为是聂斯托利教会？

一、景教与东方教会的缘起

早在基督教产生之前,很多犹太人为了躲避迫害,逃到当时属于帕提亚帝国和罗马帝国交界处的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①,东方教会的历史就可以追溯到这一边境地区的一个重要城市——伊得撒(Edessa)。

按东方教会自己的说法,1 世纪,奥斯尼尔(Osroene)^②国王阿布加尔五世(Abgar V Ukkama bar Ma'nu)身患重病,写信给耶稣请求解除他的病痛,使徒多马派遣其门徒达太(Thaddeus of Edessa)^③前往首都伊得撒替国王治病。之后,国王的病情立刻好转,为表达感谢,他召集国民接受福音。^④自此,福音便在伊得撒传播开来。^⑤3~4 世纪,以伊得撒为中心,基督教快速发展,辐射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和波斯地区。但在这一时期,东方教会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教会,而是隶属于安提阿主教管辖。

但随着波斯帝国的兴起,处于波斯境内的教会独立性逐渐提高。^⑥最终在 410 年,在帝国首都塞琉西-泰西封(Seleucia-Ctesiphon),东方教会举行了第一次主教会议,即以撒会议(Synod of Isaac),这次会议决定所有的波斯教会都应听命于塞琉西-泰西封大教长,这标志着初步形成集权化的波斯教会。424 年,达迪索会议(Synod of Dadisho)宣告塞琉西-泰西封主教作为东方教会领袖,与其他所有西方教会^⑦关系平等,不受任何外部教会管辖,这标志东方教会

① 今天土耳其的东南部地区,伊朗和叙利亚的北部地区。

② 奥斯尼尔王国最早从衰落的塞琉古帝国中独立出来,但很快沦为亚美尼亚王国的附属国,在经历短暂被帕提亚帝国统治后,于 114 年成为罗马帝国半自治的附庸国,并最终于 216 年被罗马帝国彻底吞并,成为毗邻波斯帝国的前线行省。但随着波斯帝国于 608 年吞并此地,不久便伊斯兰化。

③ 也通常称为“Addai”,一般认为是耶稣七十门徒之一,但也有学者认为其就是耶稣十二门徒中的使徒达太。参见 Di Genua, “Judas, Thaddeus, Addai: Possible Connections with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Edessan and Constantinopolitan Mandylion and Any Research Perspectives,” *Bari*, Vol. 4-5 (September 2014)。

④ [古罗马]优西比乌:《教会史》,保罗·L. 梅尔、瞿旭彤译,三联书店 2009 年版,第 52~56 页。

⑤ 以上历史缺乏考证,且或多或少带有传说的色彩,但可以确定公元 2 世纪,基督教已经成为奥斯尼尔的国家。相关讨论参见:[美]莫菲特:《亚洲基督教史》卷 1,中国神学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译,(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2~59 页。

⑥ 主要在于罗马帝国以基督教为国教之后,在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的长期对峙中,波斯王无法忍受敌对宗教教徒的存在,于是在 340~401 年发生了对于基督徒全国性的迫害,这也造成了波斯帝国内部的基督徒开始和罗马帝国教会愈行愈远。

⑦ 这里的西方教会是相对东方教会而言的教会,包括罗马教会和拜占庭教会。

的彻底独立。^①

在接下来的200年里,一方面,东方教会在内部爆发了关于教长之位的权力争夺;另一方面,外部也饱受波斯帝国的迫害和西方教会的敌意。尽管如此,教会的宣教事业并没有停止。从波斯首都塞琉西-泰西封出发,东方教会的宣教士一部分向南,来到今天的印度,建立了所谓的“圣多马教会”(Saint Thomas Christians);一部分宣教士则沿着丝绸之路,来到蒙古和中国,造就了后来的景教。据史料记载,教长耶书亚二世(Ishoyahb II)在位时,635年,波斯教士阿罗本(Alopen)来到当时的唐朝首都长安,并受到唐太宗的接见。这一时期传入盛唐的东方教会也因“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而被当时的国人“强称景教”。得益于唐朝当时宽容的宗教环境,正如历史记载,“法流十道,国富无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景教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

二、东方教会与基督论之争

历史上,东方教会之所以被人们称为聂斯托利教会,源于4世纪开始的基督论大辩论。451年卡尔西顿会议后,整个基督教世界因为基督论的不同在神学思想上分裂为三派:一是正统的卡尔西顿基督论者,秉持“两性一位”的观点,亚历山大的西里尔(Cyril of Alexandria, 376~444)和摩普妥提亚的西奥多(Theodore of Mopsestia, 350~428)同属于这个范畴,尽管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学派;二是被视为异端的一性论者,这部分持“一性一位”的观点,其神学论点源于欧迪奇主义,属于极端的亚历山大派,后被称为“雅各派”;三就是被视为异端的聂斯托利派,持“二性二位”的观点,属于极端的安提阿派。

4世纪开始的这场基督论大辩论虽然影响甚远,但并非直接影响到东方教会,而是通过伊得撒教会把当时的东方教会牵扯进来。

作为基督教在东方建立最早的教会,伊得撒教会后来虽因罗马与波斯的争霸,地位有所下降,但由于坐落在帝国交界处,又成为东方教会沟通西方基督教的门户。此外,该教会还拥有东方基督教最重要的一所神学院——伊得撒学院(School of Edessa)^②。这所学院在艾弗伦(Ephrem the Syrian)的带领下,成为当时东方教会的神学中心,许多波斯基督徒慕名而来,学习教义、教理并把思想带回波斯。正是在这里,西奥多以及狄奥多罗(Diodorus of Tarsus)的大多数著

^① Wilhelm Baum, and Dietmar W. Winkler, *The Church of the East: A Concise History*, Vol. 1, London: Routledge, 2003, p. 19.

^② 又称为“波斯学院”,大量波斯基督徒来此学习基督教神学。



作被译为叙利亚语,使得整个伊得撒教会处在安提阿派的影响之下。以此为中介,安提阿派的神学思想得以传入波斯。

当西方世界的基督论之争爆发时,在伊得撒教会内,主教拉本拿(Rabbula of Edessa)支持西里尔,而伊得撒学院的领袖希巴(Ibas of Edessa)却支持聂斯托利^①,于是二人的纷争造成伊得撒教会的分裂。鉴于西奥多的思想已经通过伊得撒学院传遍整个东方教会,并被视为圣徒,那么当他的门徒聂斯托利在西方会议上被定为异端后,东方教会必须作出回应。与此同时,这场基督论之争也被前来学习的波斯基基督徒带回波斯,因此东方教会也必须对这场神学争论表达自己的立场。

在486年举行的阿伽修会议上,主教阿伽修(Acacius of Seleucia-Ctesiphon)通过了一份被西方教会认定为彻彻底底的聂斯托利主义的宣言。这样,东方教会就被认为是“聂斯托利教会”。489年,东罗马帝国皇帝芝诺在伊得撒主教塞勒斯(Cyrus)的建议下,关闭了罗马境内被视为是聂斯托利主义大本营的伊得撒波斯学院,大批师生逃到波斯境内的尼西比斯,并在拿西(Narsai)主导下重建了尼西比斯学院,并以此为中心,继续传播聂斯托利主义。这样,东方教会被称为“聂斯托利教会”就越加名正言顺了。

三、西奥多与聂斯托利的基督论之别

我们知道,东方教会在基督论争议爆发之前,就已经深受西奥多思想的影响,因此当东方教会被认为是聂斯托利派的时候,也就造成了一个问题:东方教会到底是西奥多派,还是聂斯托利派呢?众所周知,两人都属于安提阿派,又是师徒,思想上一脉相承,共同点必然大于不同点。此外,师徒二人都强调基督二性的区别,强调耶稣人性的完全和对于神性受苦和改变的反对,甚至两人都用同样的例子来解释“道成肉身”。然而,尽管二者之间存在这些共通之处,也还是无法掩盖聂斯托利的基督论确实存在不同于西奥多的地方。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区别西奥多和他的门徒聂斯托利的思想呢?从神学上而言,区分聂斯托利与西奥多思想的关键,在于是否明确区别本性和本性之属性,即本性格的概念。

由此出发,西奥多的基督论最好的表达就是:“当我们区分本性时,我们说神

^① 希巴本人十分赞善西奥多的思想。曾经参加过431年的以佛所会议,他十分反对西里尔的观点,并在卡尔西顿会议上同聂斯托利一道被谴责。因此,当他成为伊得撒主教后,整个伊得撒教会转向了聂斯托利的一边,并被认为是聂斯托利主义者。

圣逻各斯的本性是完全的,他的位格(prosopon)也是完全的,因为我们无法说一个位格(hypostasis)^①是非位格(impersonal)的,同样人的本性也是完全的,他的位格也是完全的。当说到联合的时候,这里只有一个位格(prosopon)。”^②显然,当西奥多使用“位格”(prosopon)^③一词描述神性、人性以及二者之联合时,他对这一术语的使用实际上非常模糊。一方面,从“逻各斯”作为神之神性的角度,当西奥多说到“神性的位格”时,事实上就具有后来聂斯托利用“本性格”(natural Prosôpon)一词所指的含意;另一方面,当涉及人性时,他说的又是“人的位格”,这二者是不一样的。因为对于后者而言,决定人的本质存在的东西就是人性,这是抽象的人性。但对于前者就是十分的悖谬,神性本身就是规定神本身的本质属性,那么神性又何来位格之意?除非西奥多把“prosopon”理解为面具的含意,把性和展现性的属性区分开来,即用“nature”表示抽象的一般本性,即回到“hypostasis”的含意上,而其“prosopon”代表具体的属性,来展现特殊的性,如耶稣具体的人性。如果这样,那就具有聂斯托利主义的倾向。再者,当谈及子的位格时,他又用了“位格”(prosopon)这个词,这就无法确定其所说的“prosopon”到底是何种含意,究竟是指本性的具体属性,抑或是指抽象的本性。^④

相比之下,聂斯托利则借助“本性格”(natural Prosôpon)一词明确区分了本性与本性格之间的不同。在他那里,任何一个本性是否真实的,依据其是否具有位格,这个位格代表本性(nature)自身所有属性的集合,具有“独立存在”的含意。这就使得本性格与本性之间彻底区别开来,通过“Compensation of Prosôpon”(大意为“位格补偿”)的观点,基督的神性和人性以各自位格的方式联合在一起。由此聂斯托利的基督论最终实现了安提阿学派的最高理想——维护耶稣基督人性的完全,神性与人性被彻底地区分开来。与此同时,这一理论又最

① 早在尼西亚会议上,“hypostasis”就和“ousia”“essence”是同义词,虽然在凯撒利亚的巴西尔那里,三一论才明确了三个“hypostasis”和一个神性的“ousia”,但这两个词在基督论中仍然混用。

② Tixeront Joseph, *History of Dogmas*, Vol. 3, London: B. Herder, 1914, p. 17.

③ 在西奥多时期,“Prosopon”的含意也是模糊的。它至少有两种含意:从三一论的角度,常被等同于“hypostasis”,这表达一个独立个体,和其他实体都不同的个体的含意,但这里更多有内在不变本质的含意;但另一方面,从它希腊语用法(“面具”“面容”)上说,则表达一个物体外在展现自己身份的方式,这就和“hypostasis”不一样,这是可以变的,可以被操作的。“Hypostasis”可以有多个“prosopon”,同样“prosopon”也可以离开“hypostasis”存在,这就是聂斯托利解释一个合一位格的关键所在。

④ 关于西奥多的基督论思想,参见 Kevin McNamara, “Theodore of Mopsuestia and the Nestorian Heresy,” *Irish Theological Quarterly*, 19. 3 (1952), pp. 254-278. 文中谈到了西奥多在对于“nature”论述中抽象术语和具体术语的混乱。



终导致无法将二性真正合在一起,进而造成救赎的失败。^①

四、早期东方教会的基督论

在明确西奥多和聂斯托利基督论的区别之后,那么,东方教会真的是遵循了聂斯托利主义吗?要回答这一问题,可以通过阿罗本入长安之前东方教会的历次大会宣言分析其所体现的基督论立场。^②

由于东方教会所处环境的特殊性,前三次教会大会(410年的以撒会议、420年的亚伯拉哈会议和424年的达迪索会议)并没有专门讨论神学问题,而仅仅是单纯认可了西方教会的尼西亚大公会议和其他几次会议所通过的信条的有效性^③,直到聂斯托利争议爆发后半世纪的阿伽修会议上,东方教会才首次明确谈到神学问题。但最令人奇怪的是,在早期的历次大会宣告中,我们似乎完全看不出属于聂斯托利的观点。例如486年阿伽修大会宣告中提到了:

让我们对于基督的信仰建立在基督二性——神性和人性之上。虽然无人敢教导不同二性间的混淆和混合,虽然神性仍保留在属于它的那个东西中,人性也保存于属于它的东西中,但我们把二性的典范聚于一个权柄和一个崇拜(的对象)上,一个子的名分上,因为神性和人性产生了完美的不可分离的联结。如果有人把受苦和改变归于我主的神性,并且谈到救主的位格联合,不坚持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的声明的话,那么让他被谴责!^④

在历史上,这段宣言被认为是东方教会信奉聂斯托利主义的证据,但是仔细看,无论是对于二性的混淆的反对,还是以权柄和一种崇拜来理解位格的联合,都彻彻底底是安提阿派的基督论。这一点在后面的大会宣言中又多次得到证明,例如在585年的信仰声明中就强调:

① 当明确指出本性格存在,即意味着本性是彻彻底底的完全,那么这样的两个本性又如何存在于一个位格中呢?这就是聂斯托利难以解决的问题。聂斯托利的基督论,参见 Aloys Grillmeier, *Christ in Christian Tradition: From the Apostolic Age to Chalcedon*, Vol. 1, London: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75, p. 507.

② 共举行过12次教会大会,被认可的大会共11次(484年的巴索马会议后东方教会不被承认)。再排除未涉及神学内容的大会(前三次大会和497年的巴拜会议、554年的约瑟夫会议)后,加上612年的主教会议,共有7次涉及神学内容的会议。

③ 分别是 Ancyra (314), Neocaesaria (between 314 and 325), Gangra (343), Antioch (341), 和 Laodicea (365)。

④ 以下的大会翻译均来自 Sebastian Broc 对于 J. B. Chabot, *Synodicon orientale ou recueil de synodes nestoriens* 法语版本的英文翻译,英文翻译参见 Sebastian P. Brock, "Studies in Syriac Christianity: History, Literature, and Theology," *Variorum Publishing*, Vol. 357 (1992), p. 133.

事实上,由于他对我们的爱,他自愿离开父的怀抱,没有任何改变地来到世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身边(身体上),但没有任何的改变;那个似神的人虚己,他采取了奴隶的样式,并且他没有更多:因为无论是通过成了(肉身),还是取得(样式),他的本性仍然没有改变或增加一分。……道成了肉身,但没有改变。^①

再如 596 年会议上讲:

我们诅咒并远离所有否认主耶稣基督神性和人性的人;或者是任何敢在联合教导混合、混淆和合成的人;或者是任何敢把激情、死亡或其他属于不完满人性的东西通过某种方式归给伟大的神性的人;或任何敢把通过一种奥秘,通过不能理解的,永远不被分离的联合,已经在圣母那和自身联合的上帝的道的崇敬的殿仅仅当成一个普通的人。^②

从某些关键词语看,东方教会的基督论表述更是典型的安提阿派,或者说西奥多的用法。譬如 544 年的大会宣称:“基督既不是一个普通人,也不是一个穿上人性外套展现其自身的神,而同时是一个人,也是也是个神。”^③同样,576 年的大会则强调:“他为了他神性的居住,而通过一种不可分离的方式,从圣母玛丽亚那里为他自己取了一个完美的殿。”此外,585 年的大会也宣称:“凭借着最高的不可分离的联合,上帝的道在其肉身的殿中受到了苦难的羞辱,尽管道凭着他神性的本性而言是不会受难的。”^④不难看出,这里所用的“外套”(garment)、“样式”(likeness)、“居住”(dwell)和“殿”(temple)等词语,都是西奥多最常用的比喻。当然,在聂斯托利那里,这类表达方式同样被反复使用,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我们未找到确切谈到“本位格”的表述时,是否就可以把安提阿学派的这一思想归结于聂斯托利主义?

① Sebastian P. Brock, "Studies in Syriac Christianity: History, Literature, and Theology," *Variorum Publishing*, Vol. 357(1992), p. 138.

② Sebastian P. Brock, "Studies in Syriac Christianity: History, Literature, and Theology," *Variorum Publishing*, Vol. 357(1992), p. 139.

③ Sebastian P. Brock, "Studies in Syriac Christianity: History, Literature, and Theology," *Variorum Publishing*, Vol. 357(1992), p. 135.

④ Sebastian P. Brock, "Studies in Syriac Christianity: History, Literature, and Theology," *Variorum Publishing*, Vol. 357(1992), p. 139.



五、东方教会基督论的变迁

尽管如此,至7世纪初,东方教会在其宣告中开始体现出聂斯托利主义的痕迹。605年大会宣告:

反到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了人的样式。因为在那奴仆样式中的神的样式,创造万物的主耶稣基督,完全的神与完全的人;从神性上是完全的神,从人性上说是完全的人。两个本性:一个神性和一个人性。神性仍然保留它自身的属性……但激情、改变和变化并没有达到神性。^①

这里的宣告似乎表达出聂斯托利位格联合的含义,即样式与样式的联合,神的样式与人的样式结合,而神性的属性仍然完全,这一点在聂斯托利那里被直接以本性格代替,本性不参加联合,而仅仅是本性的位格进行联合。^② 故而从这段宣告中不难看出,在这一阶段,东方教会的基督论立场开始颇有聂斯托利主义的风格。

历史上,影响东方教会基督论神学立场变迁最为关键的事件是612年举行的主教大会。这次大会的宣告基本上明确展现出聂斯托利主义取向,概而言之:“基督被认为是神,是因为在神性的本性和位格上是完全的;他被认为是完全的人,是因为在人性的本性和位格上是完全的。……基督有两个本性和两个位格,正如他们说的,这里只有一个基督,我们承认基督是一,但不是从本性和位格上讲,而是从子的位格上说,即一种权能、一种安排、一种美德和一种威严。”^③ 在此,东方教会的主教们明确以一种区分的方式对待本性和位格。毫无疑问,这里所说的位格正是聂斯托利所说的“Prosôpon”,并且当说到作为一个基督^④的一个位格时,明确指出其建立在权能、美德、威严之上,而这正是西奥多和聂斯托利所常常表达的内容。

① Sebastian P. Brock, “Studies in Syriac Christianity: History, Literature, and Theology,” *Variorum Publishing*, Vol. 357 (1992), p. 140.

② 有关聂斯托利“位格联合”(unioin of prosopon)的观点,参见 Aloys Grillmeier, *Christ in Christian Tradition: From the Apostolic Age to Chalcedon*, Vol. 1, London: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75, p. 511.

③ Sebastian P. Brock, “Studies in Syriac Christianity: History, Literature, and Theology,” *Variorum Publishing*, Vol. 357 (1992), p. 142.

④ 聂斯托利的理论曾被指责有教导“两个基督”之嫌。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大会宣告中,“位格”一词用“quoma”来表达。主持这次会议的神学家、东方教会教父之一的大巴拜(Babai the Great)大量使用这个词语,他用如下一段文字来表达东方教会的信仰:

神子基督是一,二性被所有人崇拜;从神性上说,他由圣父所生,早在万代之前没有开端;从人性上而言,他由玛丽亚所生,始终和肉体相连;他的神性不是其母的本性,他的人性不是父的本性;二性在他们的本质中保存完好,存在于一个子的位格。正如神性是一个本性中三个本质,同样子名分存在在一个位格中的两个本性。^①

在巴拜这里,希腊语的“physis”被理解为叙利亚语的“keyane”,耶稣基督具有二性,即具有两个“keyane”。而子的一个位格,卡尔西顿会议采用的术语是希腊语“hypostasis”,聂斯托利译为“Prosōpon”,在巴拜则译为叙利亚语“parsopa”,即子具有一个位格。但关键在于,当巴拜谈到“二性在他们的本质中保存完好”时,这里“本性的本质”被单独拿出来,用叙利亚语“qnoma”单独表示,“qnoma”被理解为一个真实的本性,而非抽象的本性,这样巴拜的基督论范式就是两个“keyane”(本性)、两个“quoma”(本性的 quoma)和一个“parsopa”(位格)。当“qnoma”被具体带入巴拜的表述中时,不难看出巴拜实则在强调耶稣基督“二性”的各自完全,于是他明确使用“quoma”一词^②,以便与“keyane”区分开来,并使用“parsopa”来代表子的位格,这就不像西奥多那么含糊,而与聂斯托利的“本性位格”(natural Prosōpon)的观点是一致的^③。

因此,从 612 年的主教大会后,可以说东方教会的基督论最终与西方基督论

① Gilman, Ian, and Hans-Joachim Klimkeit, *Christians in Asia before 1500*. London: Routledge, 2013, p. 122.

② “Quoma”一词对于西方教会而言含义十分模糊,常和“hypostasis”混淆。在东方教会立,这词最初以“hypostasis”的含义运用于三一论中,即“三个 quoma 位于一个本质中”。参见 Sebastian P. Brock, “Studies in Syriac Christianity: History, Literature, and Theology,” *Variorum Publishing*, Vol. 357 (1992), p. 133. 但直到巴拜,“quoma”开始被运用于来形容特殊的“本性”(nature),并以大会宣告形式颁布。相关讨论参见 Jaroslav Jan Pelikan, *The Spirit of Eastern Christendom (600-170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p. 39.

③ 虽然巴拜没提到聂斯托利的名字,但显然他知道聂斯托利的著作《赫拉克利德书》。参见 “Introduction,” in Hilarion Alfeyev, *The Spiritual World of Isaac the Syrian* (Vol. 175), Minnesota: Liturgical Press, 2016. 此外,更多关于巴拜基督论的思想,参见 Bishop Mar Bawai, Soro, and M. J. Birnie, “Is the Theology of the Church of the East Nestorian?” *Syriac Dialogue: First Non-Official Consultation on Dialogue within the Syriac Tradition*, Vienna: Pro Oriente, 1994.



彻底区分开来,采用极端的安提阿派基督论立场。^①

结 语

总体而言,在7世纪之前,东方教会的教会宣告中并未明确表现出聂斯托利的观点,而仅仅停留在西奥多的思想中。

正如学者所言,“在6世纪里,所有涉及基督论信条的东方教会大会都表现出一个相同的特点:一个严格但正统的安提阿神学。”^②因此,单从信仰宣告上看,东方教会完全可以免于被称为“聂斯托利教会”的指控,某种程度上甚至更适合被称为“西奥多教会”,这一点又可从历次大会宣告中对西奥多权威性的反复确认中得到证实。此外,西奥多和聂斯托利的著作都是希腊文写成的,但前者的许多著作早在5世纪初就被译为叙利亚语传入东方,而聂斯托利则迟至6世纪中期,才只有一本《赫拉克利德书》被译为叙利亚文,并列入尼西比斯学院的课程,较之东方教会被认为是聂斯托利教会的阿伽修会议,晚了整整一个世纪。因而对于那一时期东方教会的神学家而言,事实上他们无法直接阅读到聂斯托利的著作,这一方面表明聂斯托利对于东方教会的影响可能并没有后人设想得那么大,另一方面,这一状况也可能造成早期东方教会无法在西奥多与聂斯托利思想之间进行有效的区分。

与之相应,从教会史的角度来说,景教作为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其与当时历史上的聂斯托利派实则并无直接的教会隶传关系。聂斯托利在世时并没有创立后来传入中国的景教,他的追随者也没有到达中国并建立一个独立的教会。就历史而言,传入中国的景教直接源自东方教会,而东方教会在聂斯托利之前就早已存在于波斯地区。因此就教会史而言,景教并非隶属于聂斯托利教会。

但从神学传统上而言,景教则又可以说继承了7世纪初东方教会的聂斯托利主义。原因在于,尽管聂斯托利本人并没有直接教导过东方教会,从教会的历

^① Richard E. Payne, “Persecuting Heresy in Early Islamic Iraq: The Catholicos Ishoyahb III and the Elites of Nisibis,” in Andrew Cain, Noel Emmanuel Lenski, *The Power of Religion in Late Antiquity*, New York: Ashgate, 2009, p. 398; Philip Wood, *The Chronicle of Seert: Christian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Late Antique Iraq*,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36.

^② 例如544年第六次教会会议上通过的第40号教规则表明:“我们接受的……(尼西亚信经)等同于由上帝的圣洁信徒、被上帝祝福的主教兼注经者西奥多所解释的。”此类对于西奥多的尊重在历次大会宣告中十分常见。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6辑

次大会宣言上看,东方教会也一直宣称自己坚守西奥多的正统教导,并且早期的东方教会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不管怎么说,不可否认的是,7世纪初的东方教会体现出明确的聂斯托利主义色彩,因而在基督论思想上又确实是聂斯托利派的。从神学立场上看,这一点在6世纪中后期日益凸显,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东方教会实际上都走向了聂斯托利主义。故而对于635年来到中国的基督教——景教而言,公允地说,却又是聂斯托利派的。

与此同时,应当强调的是,当我们说景教是聂斯托利派的时候,这仅仅是基于景教对于7世纪初东方教会信仰的直接延续才这样说的。观察到这一点,也就不难发现,那种视早期东方教会为聂斯托利派的传统观念是不合理的。换言之,景教与聂斯托利之间的联系,事实上建立在7世纪初东方教会神学思想的转变之上,而非其之前的基督论思想,或是忽视东方教会,直接把景教与聂斯托利二者联系起来。